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媒：习奥会谋求建立双边关系新模式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2013 年 5 月 27 日报道称，美中两国分歧渐增，多尼伦访华和即将到来的加州峰会等两国高层领导人频繁交流，都体现出双方正全力寻求相互交流的新模式。27 日多尼伦（Tom Donilon）与习近平会晤时称，加州峰会是双方领导人深入探讨美中关系以及双方共同面对的地区及全球挑战的绝佳契机。《美国之音》这篇报道认为美中两国正面临几十年来最严峻的挑战，相互之间的不信任逐步加深。双方分歧涉及多个领域，从朝鲜、伊朗等传统矛盾到网络安全和中日领土争端等新发问题均有涉及。因此，双方加紧寻求建立新模式的方法。多尼伦和习近平对于六月加州峰会都表示期待，并希望届时美中领导人能够在当前这样特殊又重要的时期促进美中关系发展。今年三月，多尼伦在一次演讲中曾表示，如果美中双方要建立全新的双边外交模式，就必须加强在重要问题上的合作和沟通，其中包括更加深入的军事对话、强化经济联系以及关于网络安全议题的表态。

美刊：习奥会或开启亚洲新秩序

据美国《福布斯》（Forbes）双周刊网站 2013 年 5 月 22 日刊文称，6 月 7 日和 8 日举行的旨在“重启”美中战略关系的习奥会谈是地缘政治领域当前和未来最重要的关系。文章称，中国的构想挑战了现有秩序，威胁到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美国及其在亚洲的“结盟”势力。在此次会晤中，奥巴马充其量也许只能倾听，并且开始按照中国的意愿采取一些小举措。但是，据猜想，除非奥巴马缺乏头脑，否则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或者是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文章认为，美国和中国并不具有可能导致武装冲突（这种冲突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直接矛盾的关键利益。如果要冒与中国开战的风险，那么继续承担捍卫亚洲其他国家利益的责任和负担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文章指出，应该明确一点：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存在着概念上的瑕疵，对中国构成了挑衅，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必定会失败。首先，该政策的前提和目的是巩固美国（以

同盟为基础的) 现有的优势军事地位。其次, 尽管政府的说法相反, 但该政策主要是从军事、安全角度看待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而这个角度是错误的。文章说, 但愿在峰会之后, 美国政策会把重点调整到在东亚的真正利益上, 同时坦率承认美国不是亚洲国家, 不该再想当然地掌握该地区的指挥权。

美智库: 习奥峰会重在战略大局 牢固私人关系

据多维新闻网 2013 年 5 月 23 日报道, 美国智库中国问题专家表示, 将于 6 月 7 日举行的中美首脑会晤力求“抓大放小”, 着眼点径直放在谋划中美战略大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包道格 (Douglas Paal) 表示, 中美元首决定“不打领带, 挽起袖子”, 显示双方希望省却一些外交小节, 避免照本宣科, 留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讨论困扰彼此关切的问题”。他强调中美树立共同战略目标极为重要, 否则中美之间就无法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分歧。经过四十多年的接触交往, 中美的确需要通过领导层对话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中方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 不过应对其中的挑战尚需领导层具备远见和毅力。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史剑道 (Derek Scissors) 指出, 与以往峰会相比, 此次“习奥会”还有一大特点, 即双方未必发表正式公报, 但会注重建立两位元首间的私交。他表示, 尽管领导人的私交从属于国家根本利益, 但“私交是有用的, 特别是发生危机的时候”。包道格也认为, 私交对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分歧会有帮助, 不过还是“巧妙的中美战略更重要”。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III) 21 日称, 习近平与奥巴马的加州会晤显然不是为解决实际问题, 更重要的是借此“牢固地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

诺奖得主斯宾塞: 习奥会定调未来十年世界经济

据多维新闻网 2013 年 5 月 25 日报道, 中美交流基金会与美国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 5 月 22 日在华盛顿共同举办了“展望未来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研讨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 (Michael Spence) 在会上指出, 两国领导人不应该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两国的分歧上, 而是应该关注两国的共同利益。未来十年里, 个别的经济体系必定会经历重大的结构调整, 全球经济也将会经历巨大的重新配置。这都取决于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所采取的政策, 以及他们能否积极合作, 创造和保持一个对全球有利的、稳定和开放的经济环境。斯宾塞还表示,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互补性正在迅速地改变, 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不会下降的。当然伴随这些变化而来的是全球经济的挑战 and 不确定性, 进而凸显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一个富有成效、积极合作的双边关系将会促使两国调整他们的政策和体制, 以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斯宾塞总结道, 除了双边利益, 世界经

济也和中美关系息息相关。随着经贸开放、金融稳定和气候问题接踵而来，没有中美两国发挥领导作用，很难想象世界还能够持续平衡发展下去。

美政府首次与企业分享网络情报

据路透社新闻网 2013 年 5 月 24 日报道，为了反击黑客的网络攻击，美国政府将史无前例地与民营企业分享机密信息数据。该媒体近日报道说，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路透社网络安全峰会上，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纳波利塔诺透露，美国正在开发一种防护软件系统，可以通过扫描银行、保险公司等关系国家日常运作的企业的电子邮件检测并阻挡黑客的攻击。他表示，大多数美国民众尚未意识到政府已经具备防范黑客攻击的能力。据悉，政府将通过这种方式把掌握的网络漏洞方面的信息分享给还不知情的企业。纳波利塔诺说信息来源的渠道不一，其中包括情报机构提供的。而国土安全部和其他情报机构为了监督海外网络，已经侦察到很多网络浏览器的漏洞。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无直接渠道确保政府同那些不受政府保护的民营公司共享机密数据，而这些公司有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今年 2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授权电信和国防公司向公用事业单位、银行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提供相关技术服务，费用由接受服务方支付。国土安全部将同国家安全局和其他一些部门实行信息共享，然后提供数据给具有政府安检资格的部门或公司，由后者汇总网络数据和相关内容，鉴别并筛选出恶意邮件群。纳波利塔诺还披露说，检测还可能包括网络攻击。其攻击方式已经被美国政府掌握，但是一些软件商或者企业还不知情。美国情报机构曾经就黑客攻击的具体问题提醒过微软和谷歌等软件商或国土安全部的官员。美国政府正在开发的防护软件系统，能准确定位实施攻击的电脑。据另外消息，美国国会也已经通过了《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以解决相关问题。

美海军作战部长：重返亚太关键在于合作

综合国外媒体 2013 年 5 月 15 日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奈特(Jonathan Greenert)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重返亚太的基本精神在于合作，美国期待在亚太地区扮演有效的角色。格林奈特在出席于新加坡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海事防卫展览暨会议”(International Maritime Defense Exhibition and Conference, IMDEX)时发表演说，并阐述美国重返亚太政策。他表示美国的安全、经济利益甚至未来发展与亚太关系密切。当前，美国海军在全球部署了 100 多艘舰船，其中约 50% 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便集中在亚太地区。格林奈特还表示，重返亚太绝对不仅是投入专家或物资，美国关注如何秉持“合作”精神，在该地区扮演有效角色，例如打击马六甲海峡的

海盗、制裁日益严重的人口贩运、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等；美国支持和平、建设性的关系。他敦促亚太国家建立相关协议，决定共同的沟通模式。这些协议的名称是什么无关紧要，其重点是确保相互之间的交流对话。格林奈特表示，军事海事咨询协议（**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促使美中近来保持良好互动。美国应该和亚太地区的国家建立互信，对此可以采取包括军事演习等可行的方式。

美忧日韩关系冷淡让中国收益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2013 年 5 月 16 日报道，韩国总统朴槿惠上任后首访美国获得了外界的高度评价，被普遍认为取得了巨大成功。朴在上任伊始就面临朝鲜的一连串挑衅行为，一度令东北亚局势陷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而她此次访问得到了美国对韩国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再次承诺。美智库曼斯菲尔德基金会(**The Mansfield Foundation**)执行董事戈登·弗雷克(**Gordon Flake**)表示，美韩同盟关系并非天生，能够获得奥巴马总统的安全承诺是朴槿惠此次访问的一大成果。虽然朴槿惠对华盛顿的访问强化了美韩同盟关系，但一些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安全专家担心，韩日这两个美国最重要亚太盟友的冷淡关系将不利于地区安全。弗雷克还认为：“美韩有牢固的同盟关系，美日也是如此，但日韩之间的联系却很弱。日韩关系以及双方频繁的纠纷削弱了美国有效解决朝鲜问题的能力，还削弱了面对中国崛起的能力。”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目前任全球战略公司奥尔布赖特·斯通布里奇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高级主任的埃文斯·瑞维尔(**Evans Revere**)认为，日韩关系冷淡或许会让中国受益。“首尔与东京的关系低迷，谁会从中获益？平壤会；另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北京也会。美国在东北亚最大的两个盟友不能和睦相处。”媒体评价，在朴首访选择美国以加强美韩同盟关系的同时，她也需要谨慎处理同中国这一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据称，朴槿惠在赢得选举后不久就与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而中国也将是她下一个要出访的国家。相关专家评论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其经济影响力、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韩国对参与那些似乎是针对中国的活动就越来越谨慎——这也是为何韩国还没有加入 **TPP** 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要保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又不能把中国这一最大贸易伙伴惹恼。而朴在华盛顿时就已经表示她将在接下来访问中国时与习近平主席进行坦诚的对话。

美众院外委会主席促菲正式致歉

综合国外媒体 2013 年 5 月 21 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Ed Royce**），

今天通过媒体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应与台湾就枪击渔船案展开联合调查，并向台湾当局及人民正式道歉。据悉，罗伊斯是众院“台湾连线”成员，担任国会议员以来，在外交问题上支持台湾向来不遗余力。“中华民国”驻美代表金溥聪对罗伊斯公开仗义执言表示感谢。罗伊斯在声明中首先向死者家属表达哀悼，并呼吁菲律宾与台湾当局直接合作解决事件所引发的问题。罗伊斯表示，“通过展开彼此信任的联合调查，确认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上达成相互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罗伊斯认为，菲律宾政府应向台湾当局及人民正式道歉，并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他同时呼吁，菲律宾与台湾应就渔业协议展开协商，确立双方都能明确的行为方式，以避免将来再发生类似事件。

重点关注

中美会计争端解决前途乐观

中美两国关于会计和审计方面的争端正持续发酵。和两国之间许多其他争端相比，如贸易、世界联盟体系、黑客或军事方面，会计问题以前从不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据美国《外交》杂志的博客“太平洋财富”去年的报道，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摩擦已非常明显。

上周发生的一切终于能让我们了解此事件的一些端倪。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委员、目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的吉利斯（Gillis）教授在其专门讨论中国会计问题的博客上表示他对此次会计争端的解决持乐观态度。

吉利斯教授援引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主席多蒂（Doty）的话说“我们很快就会宣布出台一个旨在交换要求调查和纪律检查的文件。”此外，吉利斯教授还表示，有关方面会采取措施避免在华盈利能力很高的美国公司退市或遭遇大麻烦。

虽然结果还没有出来，而且有关各方对此事的处理方案是否满意还不得而知，但至少来说，目前的做法可以让大家冷静下来，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另外，如果能全部或部分解决这一中美之间的争端，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相关争端也能按照相似的方式得到解决。

虽然目前的解决方式看起来不错，但其中仍有一些问题。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会做出重大让步，因为来自中国的相关文件会被审核并重新拟订。而该监察委员会或其他外国监管部门则担心此类重新拟订会否因涉及敏感信息而遇到阻力。

鉴于有关涉密信息的规定，中国方面也会做一些大的让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肖钢上任以来在打击违规行为方面表现强势，中美之间在相关领域内的合作也已取得进展，这些都是促成问题解决的积极因素。

即将开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宣布此事件得到部分解决的一个理想平台。虽然离全部解决还有不少距离，但坚冰已经打破，前途还是光明的。

（文章来源：2013年5月22日《外交学者》网站，作者：詹姆斯·帕克 James Parker）

美国能源自给重塑国际政治

现在，你可能已经听说美国能源革命了。钻探技术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已经让人们在美国找到了新的油气储藏，足以显著降低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

以下数字会说明问题：美国石油产量已扭转了持续 30 多年的下降趋势；过去三年，美国从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欧佩克）产油国进口的石油数量减少了 20% 以上；过去五年，美国天然气的储量和产量均显著增加，而价格则下降了 75%。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测，美国可能在 2020 年前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并可能在 2035 年前实现能源自给自足。这将改变格局。

这并非免费的午餐，但也不应该惧怕它。石油的生产流程很复杂，而且耗资不菲，如果这个行业不够小心，还可能会给环境带来危害。但它的潜力很惊人。国内就业已开始明显增长，经济扩张也已开始显著增强。但我们不要只着眼于对美国的影响，应该考虑它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有着怎样深刻的意味，因为这场革命也会对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变化。

自二战结束后，“资源短缺”这个理由一直是塑造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力量之一。如今，多亏了美国油气行业的技术知识和大胆开拓，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资源丰富”将成为常态。技术将把美国变成一个能源出口国，同时也会找到隐藏在其他国家的储备。由此导致的供应激增意味着，全球能源行业将开始像一个更“正常”的市场那样行事，在这个市场上，供需会更平衡，优质产油国手上集中的权力也会更少。

能源丰富的国家，比如像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或委内瑞拉，可能会遇到严重的麻烦。更高的能源价格和市场支配力，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得以用补贴和其他社会开支项目提升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但当它们的顾客能自己生产出更多能源，或者有其他供应商可选时，它们将被迫快速且

明智地适应产生的后果，或是对那些后果采取应对措施。

另外一个重大转型将来自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二战初期，美国供应了全世界 63% 的石油，德克萨斯州是全球石油供应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阿拉伯半岛、伊朗和伊拉克生产的石油加起来还不到 5%。但到了 1960 年，新发现的能源促使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委内瑞拉联合起来，成立了欧佩克。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日产量增加了 1300 万桶，欧佩克的成员国开始要求从在它们的领土上开展业务的西方石油公司那里获得更大份额的利润。卡塔尔、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尼日利亚也加入了欧佩克。

随后事情发生了质变。1971 年 3 月，德州的生产能力达到了顶峰。在接下来的 5 年里，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其他生产商也获得了重要的市场支配力。1973 年 10 月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促使欧佩克发出石油禁令，我们此后便一直生活在畸形的市场之中。从那时起，如何获取外国石油就成了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核心议题。

让我们快进到 2013 年。随着美国在努力进入能源自给的新时代，政府将更不情愿去冒险损失生命，它在确保油气能自由通过危险地带的问题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对中东来说尤其重要——不管效果是好是坏，奥斯曼人，之后的欧洲人，以及最近的美国人，都在维持该地区的和平。美国并不打算完全放弃这个地区，起码在世界经济仍然严重依赖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往来，而且以色列仍存在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不会这样做。但是，随着美国对中东的能源依赖的降低，华盛顿在当地承担风险 and 责任的意愿自然也会降低，至少在这个财政拮据的年代，这种意愿就显得更缺乏依据了。

有趣的是，虽然该地区的动荡对美国的影响在减少，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却在增加，而且中国也会更直接地卷入当地政治。据国际能源署推测，到 2030 年，中国近 80% 的石油都将依赖进口，而且这些原油中的大部分都将来自北非和中东。有些估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页岩气储备甚至比美国的还要多，但中国目前还没有开采它们的技术和知识。

即便中国迅速掌握了相关知识和专业技术，它也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把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部署到位，使中国国内的油气行业成熟到每年都能有大量产出的程度。因此，随着中国参与他国政治的意愿增加，中国领导人将会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能源蕴藏丰富的中东政府在失去来自欧美的大客户后，必然会对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富有的外国友人表示欢迎。

与所有革命相似，美国丰厚的新能源贮藏提出了一些引人瞩目的问题。美国的参与减弱和中国的参与加强将使这个世界上最不稳定地区发生什么变化？在一个欧佩克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市场支配力的世界中，下一代沙特领导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还有什么期望？卡塔尔对其他阿拉伯国

家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政府的支持，以及中国把阿联酋作为人民币离岸贸易中心的兴趣会否使沙特陷入危险的孤立状态？伊朗的革命能否满足人们建立一个更加现代的经济体的要求？

这些问题跟美国关联在减少，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世界。

(本文作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是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著有《各自为政：零国集团世界中的赢家与输家》(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肯尼斯·A·赫什(Kenneth A. Hersh)是 NPG 能源资本管理公司(NGP Energy Capital Management)的首席执行官。文章来源：2013 年 5 月 24 日《纽约时报》)

美国经济外交不给力

2011 年，作为美国国务院一个经济发展项目行动的一部分，一个由美国高科技企业高管和天使投资人组成的小组来到北非。当地的创业者蜂拥至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研习会，因为这些美国人会在那里评价他们的商业计划，并鼓励他们成立创业公司。这次行动体现了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把“经济治国”置于美国外交政策设想的核心。

但是由于这个项目资金十分匮乏，以至于胜出者都没有获得任何奖励。尴尬的代表团成员胡乱想出一个奖项：去底特律的一家创业孵化基地实习的机会。

今天，中东是一个经济炸药桶。阿拉伯世界有 60%的人口年龄低于 30 岁；这里需要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否则已经高涨的失业率将会爆炸。奥巴马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努力应该更加注重经济而不是军事。前任国务卿助理托马斯·R·奈兹(Thomas R. Nides)称，“美国政府在关注中东经济问题上十分失败。这里有大量的年青失业人口，而且没有希望。”这种说法并不新鲜。克林顿在一年多前就说过，“想要成功，阿拉伯要在政治上觉醒，也必须在经济上觉醒。”她的继任者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本周说，“经济政策就是外交政策。”

上个月，他请求国会批准创建一个 5.8 亿美元（约合 35.6 亿元人民币）的“激励基金”来奖励中东和北非那些实施改革、支持市场经济、民主模式、法庭独立以及公民社会的国家。但是克林顿去年提出类似基金会的议案在国会得到的支持很少，可以理解国会当时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现在，随着自动减赤计划的实施，克里的提议可能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大规模开发的行动资助必须考虑能否在该地区建立可自我维持的发

展，否则在政治领域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找到创新性途径，在一个财政紧缩的时代实施经济治国方略。激励基金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其金额跟美国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投入的 1.2 万亿美元比起来是九牛一毛。

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成功地自行实施了基金会要鼓励的那一类改革。过去十年里，作为为加入欧盟(European Union)所尽的部分努力，土耳其贯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严苛的改革计划，开放本国经济、吸引国外投资。今天，没有几家土耳其企业在乎土耳其是否是欧盟成员国。让土耳其引以为豪的是，它在 2011 年的经济增速快于其他欧洲国家。

在约旦河西岸，最近辞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总理职务的萨拉姆·法耶兹(Salam Fayyad)实施的经济和保障改革更是值得称道。克里还应把那些具有可发展的市场和伙伴的领域作为援助重点。在约旦河西岸经营一家科技公司的巴勒斯坦工程师塔里克·马艾哈(Tareq Maayah)说，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 10 万美元帮助他的公司赢得了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试用机会。今天，他的公司在没有政府相助的情况下，为思科公司(Cisco)、惠普和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开发软件。

硅谷的风险投资人、埃及裔美国人艾哈迈德·阿勒菲(Ahmed El Alfi)说，美国官员能以微乎其微的成本“做得更多”。在开罗创立了高科技孵化器的阿勒菲说，埃及的创业公司大声疾呼着要和美国投资人接洽。他建议，“每周给该地区的公司打一个电话，让他们给美国公司做十分钟的陈述。”

最后，克里应该对美国公司强调，这个地区是存在投资机会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航空领域的机会尤其多。2011 年，中国公司对中东和北非的出口额达到约 1500 亿美元，是美国公司在该地区出口额的两倍。

当然，对美国私人投资来说，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太不稳定。但在另一些国家，促进贸易、投资和就业岗位创造的公私合作项目可以得到扩展，这些项目几乎无需纳税人的资金。应该增加并资助克林顿发起的科技创业代表团。应要求富裕的波斯湾国家为中小型企业出资成立一个区域银行。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应打住能在一夜之间转变社会的想法。即便美国完美地实施了它的政策和计划，单靠它们是无法稳定这些国家的。我们需要具有生命力的本地合伙人。国家必须自力更生实现转变。

我们应该把心气放低一些，把精力集中在长期的经济上。在更长的时间内设法做更少的事，我们会收获的更多。

(本文作者戴维·罗德(David Rohde)，路透社和《亚特兰大》(The Atlantic)杂志专栏作家，曾任《纽约时报》记者，著有《战超越战争：重构美国在新中东的影响力》(Beyond War: Reimagining American Influence in a New Middle East)一书。文章来源：5月17日《纽约时报》)

未来无人机让太平洋难太平

本周，美国海军将从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发射一架完全自主控制的无人作战飞机，无需飞行员的远程操控。这架无人机随后将尝试降落在同一艘航母上，这样的操作在世界上只有相对极少的人类飞行员能够完成。这次演习代表着军事历史上一个新篇章的开始：自主无人机战争。然而，在潜藏巨大危险、正在升温的美中军事对抗中，这也是一个不祥的转折。

X-47B 这种隐形飞机被海军官兵们昵称为“机器人”，它是架个头不小的飞行物，长达 38 英尺（约合 11.6 米），翼展 62 英尺，以高亚音速飞行，最大飞行距离超过 2000 英里（约合 3218 公里）。然而，“机器人”内部聚合的科技才是改变东亚局势的东西。它的起飞、飞行和着陆可以完全做到计算机控制，这增加了一种可能性：未来，几十、数百架“机器人”的下一代无人机可能同时参与作战。

它还能承受足以杀死飞行员或摧毁一架普通喷气机电子设备的高辐射：这架试验机的下一代除了能携带传统炸弹，还可能装载高能微波设备，这种设备能发出高辐射，摧毁高技术水平敌人的电网，让所有与之相连的设备停止运行，包括连接卫星、船只和精确制导导弹的计算机网络。

当然，在中国突击进行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中，这些都是它所投资的关键领域。就在美国海军发射一架自主无人机的同时，中国海军正在奋力赶上，试验从航母上进行载人机的飞行。去年 11 月，中国海军将一架 J-15 战斗机降落在了这个国家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甲板上。

虽然要开发出能媲美美国技术的航母，中国还有许多路要走，但这次的战机着陆显示了它的雄心。中国海军有约 50 万军人，舰船数量很快就将达到 1000 艘，按照某些衡量标准，中国海军已经是世界第二。

在这样一支海军的支持下，中国政府正试图对深入太平洋的一系列岛链投射军事力量：第一条从朝鲜半岛向南延伸，到台湾东部海岸往下，环绕南海；第二条是从日本向东南延伸至小笠原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涵盖美国领土北马里亚纳群岛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关岛。一些

非官方的中国军事著作中甚至提到了第三条岛链：夏威夷群岛。

要投射这样的军事力量，中国不仅要依靠舰船的数量，也要依靠其科技实力。要想拒美国人于半个大洋之外，需要中国具有精准的远程打击能力，而开展这种打击需要靠卫星侦察、网络战，以及加密的通信连接和计算机网络，过去 10 年，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已经达到了近 1000 亿美元(约合 6140 亿元人民币)。

对于两国来说，理想的情况是，中国的努力将会给该地区带来新的力量平衡。但为了对抗中国在数量上的优势及技术上的进步，美国海军在无人机上大举押注——不仅有 X-47B 及后续机型，还有反潜无人侦察机、远程无人通信机，甚至还包括无人潜水艇。一架“猎杀者”无人机，与一架 Triton 无人侦察机和一架 P-8A 海神(P-8A Poseidon)反潜载人机一起，能够在一次任务中覆盖 270 万平方英里（约合 699.3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世界上两大海军的军备竞赛削弱了实现新力量平衡的可能性，随着美国部署数百架、甚至数千架无人机，以及中国努力寻找应对新挑战的方法，爆发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加。由于无人机的价格便宜，且不需要飞行员，这降低了美国军方领导人采取攻击行为的门槛。一旦中国不可避免地获取无人机作战能力，该国海军采取攻击行为的门槛也会降低。实际上，上周有报道称，中国正在准备对自己的隐形无人机进行飞行试验。

海军的竞争本身不会挑起战争。事实上，在和平时期，海军行动是一种外交策略，向对手展示足够实力，作为制止战争发生的威慑因素。但这种情况的前提是两国建立了更广泛的政治关系。

目前，中美关系实际上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只要这种关系仍然充满活力，对抗就不符合两国的利益。但一旦这种脆弱的关系突然中断，就没有什么覆盖面较广的政治关系来取代它，更不必说什么联盟了。从危机到冲突，只需要两支越来越强大、危险的海军准备发起以无人机为主的战争。因为我们还没完全了解这种战争的后果，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可能卷入这种冲突之中。

(本文作者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是一名记者，撰写了即将出版的《不眨眼：现代超级无人机的兴起》(Unblinking: Rise of the Modern Superdrones)，文章来源：5月14日《纽约时报》)

(新闻部分编译：梁辰、刘振宇等)

焦点分析

亚太海上力量的变局

虽然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统治地位几十年来未受到挑战，但目前五角大楼军费紧张，能否保持对中国海军的优势还不得而知。

中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其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轻型护卫舰，以及刚服役的航母。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海军先后装备了从俄罗斯购买的四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以及十艘国产新型驱逐舰和护卫舰。其中不少国产舰艇已批量投产。从任何一种角度来看，中国海军的发展势头都非常迅速。

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起步，到目前快速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这引起了美国国防部门的注意。2009年，美国一个不太为人知的机构——海军情报办公室——将中国水上力量的发展描述为“相当快的”。而五角大楼最近一期的《中国军力报告》也认为中国海军自2008年以来取得长足进步。

无疑，“辽宁”号航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但中国海军的真正实力在于其水面舰艇，凭借这些强大的主力部队，中国可以在亚太甚至更远的地区扩展自己的影响。在未来几年里，这些舰艇将护卫航母，同时在相应的水面战斗群中承担任务，在争议水域施加威慑，并在较远的战区维持秩序，在全球范围内承担海军外交的作用。

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人质疑中国海军能否将物质上的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战斗力。也有人认为美国海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具有无可撼动的优势。虽然中国试图在海上和太空中和美国较劲，但一些专家认为至少海上美军仍然非常强大。

从战术上说，持上述观点的人认为在敌方战舰发出攻击之前，美军就有能力先发制人，给予其致命一击。在海战中，舰载战斗机在一定距离内可以对水面舰艇发射导弹，这里的“一定距离”指超出战舰火炮的射程。这种战事推演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军事理念，即在弓箭手射箭之前就把他干掉。

美国海军的优势地位将会持续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扩大，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统治局面还

会继续。

但这还得打个问号。

首先，中国的水上力量正在不断发展，并在核心竞争力方面进步迅速，已逐步缩小了和美军的差距。多年以来，中国的军舰缺乏有力的空中保护，这样敌方可以轻易地在空中发动攻击。这一短板让美军指挥官坚信凭借航母就可以轻松击溃中国海军。不过，目前中国海军已配备有对抗美国反舰武器的尖端设备。“旅洋”级导弹驱逐舰已装备了尖端雷达系统，根据中国军事专家的说法，该系统和美国“宙斯盾”级系统在外形和性能上相差无几。有了这套系统，加上其他电子设备，中国海军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外即发现并锁定敌方军舰。

此外，中国海军还配备有俄制和国产的反舰巡航导弹，其射程达 120-130 海里（约为 22.2-24.1 公里）。在美国海军的武器库里可以与其相比的是用了近 40 年的“鱼叉”反舰导弹，但其射程还不到 70 海里（约为 13 公里）。换言之，中国海军的主力舰艇不仅不怕美国战机，而且还能接近美国军舰并发射反舰巡航导弹。现在是中国的弓箭手占据主动了。

这样，在攻防两端都对中国有利，美国海军的优势正逐渐被侵蚀。

另外，美国海军的水面力量是否也在不断增强还不得而知。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其海军的发展速度并不快，多数舰艇只是在和平水域巡航。的确，美国在海上的统治地位无可置疑，但实际上，美军在战术技巧和硬件设备方面的进步并不明显。为什么不打一仗试试刀锋呢？

其实，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地面力量，而不是在海上和敌方一较高下。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对付叛军和恐怖分子相比，进行海上作战需要不同的战略和战术。同时，导弹驱逐舰也需要承担更多职责，包括弹道导弹拦截。所有这些都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包括资金、人员，以及舰艇配给等。

海军因为海上战争而存在，然而，在当时海军部队已经将海上战争置于不太重要的地位，由此无疑导致海上控制权所要求的硬件（武器、感应器、和舰船）和软件（训练和演习）深受其害。在预算捉襟见肘的年代，完全改变二十多年来水面战争备战持续下降的局面不是件容易、迅速的事情。简言之，当前有关美国海军霸权优势的观点正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尽管如此，如果将所有注意力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队所取得的作战进步或其能够牵制美国海军舰队的战略尝试将犯下严重错误。竞争并不仅仅指新式武器，或比较进入《简氏战舰大全》的舰只数量。衡量海上部队能力的唯一有意义标准是在关键时刻在关键海域针对最强大对手迅速集合超强战斗力的能力。正如一个伟人曾经讲过的，胜利是无可取代的。

根据这个苛刻的标准，尽管拥有技术优势，美国海军是否保持了传统霸权地位，这一点还远

远不清楚。出于各种原因——远离战区、随之而来的前进基地和补给舰只需求、造价高昂的武器、士兵薪酬和养老金——美国在亚洲海区部署作战部队的成本远高于中国。唯一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五角大楼能否负担得起在竞争对手的后院部署强大军事力量，海军服役部队是否在人员和硬件方面做出了正确投资来建设这种军事力量，美国海军士兵是否具备打赢战争的必需技能。

这是不是从全新的角度解读美中竞争呢？在中国海域或太平洋西部海域发生纯粹的舰艇对抗是不可能的。在这些海域，中国具备运用海军力量组合发动海上攻击的绝对优势，中国不仅能调度水面舰队，还可以部署装载导弹的潜艇和海上巡逻艇。此外，基于陆地的海上力量能够打击作战半径内的任何海上舰只。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发射反舰导弹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机也可以加入战争中来。尼尔森勋爵在利用陆基武器协助海上舰队作战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贤明地指出舰船对打击要塞一无是处。今天更是如此，因为中国的海上要塞绵延几百英里。

那么可以想象美国海军的一部分将与中国的海军力量进入全面对抗。美国海军现役部队分散在亚洲和世界各地。为了评估海上舰队发动攻击的结果，我们需要知道美国有可能投入多少海军实力——包括空中和海上军事力量，以及像日本海上自卫队或韩国海军这样的盟国军队愿意提供的支持——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反介入武器掩护下的海军舰队。（假定中国的指挥官能够做出精明的战争决策并组织舰队发动进攻。）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海军实力胜过美国海军的联合舰队派遣队，那么中国海军就足以胜任政治领导人交给他们的任务。如果不能，美国及其盟国就将占有一定优势。

摆在华盛顿面前的当务之急是保持或扩大美国海军针对中国整个海上军事力量的优势地位。实现这样的目标很困难，尤其是在当前的情形下。财政陷入拮据，由此导致海军整体面临压力，军队创新能力面临考验。

为了实现收支平衡，美国海军正在使用包括沿海战斗舰在内的轻型战舰取代具有更大攻击力的多任务战舰。然而海军舰队发现最可能的对手胜过了他们，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新型反舰导弹恢复远程打击能力还需几年时间，或者要等到包括电磁轨炮或舰载激光器在内的高端武器提高了主炮打击能力之后。

从大战略角度看，武器研发上的落后可能留下一个危险地带，北京方面有可能会在地域优势丧失前就发动攻击。1904年，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就犯下了类似的勿失良机的错误选择，认为对手俄罗斯正在为太平洋战区建造新的战舰。同样地，1941年，未等美国按照1940年《两个大洋海军法案》建成的全新海军到达太平洋战区并改变对日海上作战平衡，日本就袭击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美国及其盟国必须保持警惕，以免北京抵不住诱惑而通过武力解决海上争议。

作为美国海军的制胜武器，潜艇同样让中国的战略家着迷，那么潜艇是重要的平衡力量吗？许多西方学者似乎这么认为。他们把水下战争看作是护身符，认为美国海军可以轻易地潜入水下对中国海军发动袭击。潜艇作战员十分坚信美国及其盟国舰艇比任何中国海上力量都有优势。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质疑盟国所具备的质量优势，并且我们的确认为水下舰队是美国的核心竞争优势。

尽管盟国的舰队拥有质量优势，但是数量却是大问题。按照重返亚洲战略，美国海军 72 艘潜艇中的 60% 驻扎在太平洋水域。但是其中的 18 艘是俄亥俄级弹道或巡航导弹潜艇（14 艘弹道导弹核潜艇，4 艘导弹潜水艇），用于发动海岸袭击。这意味着剩下的 54 艘攻击型潜水艇可以用来对抗中国海军，其中的 60% 将部署在太平洋。这听起来有些多，但是要记住没有哪一艘潜艇能时刻处于备战状态。日常保养，长期大修和加油，人员休息，以及训练都要放在潜艇的时间表中。

美国海军流传至今的一个格言认为要有三艘舰艇停留在外国海域才能达到时刻有一艘舰艇处于作战状态的效果。其中一艘在造船厂，完全不能服役，另一艘等待部署，第三艘才在巡航。3: 1 的比例实际上夸大了用于作战任务的船只比例。使用这一比例，美国海军指挥官随时都有 11 艘潜艇可以投入战斗。假设从大修到部署的时间不变，另外 11 艘潜艇也可能处于各种战备状态。

22 艘攻击型核潜艇，不管每一艘性能有多好，也不足以在战时覆盖整个中国海域和西太平洋海域。理论家 Julian S. Corbett 建议海军指挥官将潜艇部署在对手舰队的启航点，目的地（知道的情况下），或是像海峡这样的重要区域，因为从地点 A 到地点 B，舰队需要聚集在一起穿过海峡。不然就很难接触到对手的舰艇。监视中国的海港，以及包括吕宋海峡和琉球群岛通道在内的狭窄水域将有助于提高战术准确度，但是会束缚美国潜艇编队，这反过来给了中国海军更大的作战区域。

海峡战争依然具有优势，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海军的能力，而且因为中国海军忽视了反潜作战。要想从水下击败中国海军，美国海军需要更多的能力——也就是更多的舰只。如果海军高层和权威人士认为当前美国海军战无不胜，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在与北京的战略对抗中，将潜艇力量扩大一倍将是华盛顿的明智之举。

该如何看待这一点呢？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要把美国海军当成衡量中国海军规模和组成的标准。这会误导一些人。正如本文指出的，合适的标准应该是海军在重要水域对抗最强大对手并完成政治领导人指派的目标的能力。北京方面的近期目标以及可能的对手都在其岸基武器构筑的要塞的打击范围内。将岸基和海基作战力量结合起来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水面舰艇。为了实现目标，中国海军或许并不需要一支跟美国海军相匹配的水面舰队——包括航空母舰，空军

部队，驱逐舰等在内。

观察人士必须选用适合中国的特定标准来评判中国海军是否实现了所需的军力平衡。如果与美国海军这样在全球部署的海军作比较，就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了。

本文作者园田义明(Toshi Yoshihara) 和霍姆斯 (James Holmes)，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学教授，园田义明担任亚太研究 John A. van Beuren 教授，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章来源：《外交学者》网站 2013 年 5 月文。

(梁辰、王子磊编译)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